

·专家论坛·

论流行病学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

宋雷鸣 汪宁

361005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(宋雷鸣); 102206 北京,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(汪宁)

通信作者: 汪宁, Email: wangnbj@163.com

DOI: 10.3760/cma.j.issn.0254-6450.2017.11.001

【摘要】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,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影响资料的收集过程。反思流行病学资料收集过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,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,有利于获得更加深入和有效的研究资料。

【关键词】 流行病学; 研究者; 被研究者

基金项目: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(14CMZ013);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(2002ZX1001-001)

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subjects i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Song Leiming,
Wang Ning

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/Ethnology Xiamen University, Xiamen 361005, China (Song LM); National Center for AIDS/STD Control and Prevention,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, Beijing 102206, China (Wang N)

Corresponding author: Wang Ning, Email: wangnbj@163.com

【Abstract】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subjects would influence the data collection process i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. It would be conducive to obtain more in-depth and effective research data and find the problems or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if we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subjects.

【Key words】 Epidemiology; Researcher; Subject

Fund programs: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(14CMZ013); National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China (2012ZX1001-001)

流行病学家除了要在实验室里面对病毒、基因、分子和患者等生物学对象外,还要像人文社会学者一样,在社会生活中面对复杂多变的个人和群体,了解他们的行为、心理和思想等,以求从中发现影响疾病和健康的各种线索。流行病学家通过访谈、问卷和参与观察等方法向被研究者收集资料时,要与被研究者发生各种各样的互动关系。研究者和被研究者(或者说调查者和被调查者)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,难免会受到阶层、权力、族群、文化和个人性格等因素的影响,从而可能产生不平等、不信任、误解、敷衍甚至敌意等不利于资料收集的状况,造成不同程度的信息偏倚,影响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。因此,在资料收集过程中,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能否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,会对研究结果产生重要影响。反思流行病学资料收集过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,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,将有利于研究者获得更加深入和有效的资料。

一、研究者的身份特点影响着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

研究者面对被研究者时,研究者的身份特点如职业、性别、年龄、性格特点和穿着打扮等都可能会对被研究者产生影响,进而影响他们的互动,以及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。

1. 职业: 研究者不同的职业身份会使被研究者产生不同的反应或期待。以性病艾滋病项目中对女性工作者及其男性嫖客的访谈为例。若访谈者身份是警察,被调查者对相关问题坦诚“交代”,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若访谈者身份是医生,而被访谈者在疾病或健康方面有所疑问时,则倾向于对访谈者知无不言。当访谈者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或学生时,访谈者一般无助于被访谈者,实际上是访谈者有求于被访谈者,而被访谈者却对访谈者无所期待,这种情况下想要获得深入有效的信息最为不易。访谈者必须想方设法与被访谈者拉近关系,以求得到被

访谈者的信任。上述3种情况,因研究者身份的不同,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也随之变化,分别呈现为“权力关系”、“需求关系”和“信任关系”。在流行病学项目中,研究者往往会以医生或专家的身份开展调研。但流行病学研究者不是临床医生,对于被研究者的疾病或健康问题并不能给予直接的帮助,因此并不是理想和便利的“需求关系”,尚需向“信任关系”靠拢。

2. 性别:有不少学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适合做个人访谈。在很多社会中,女性通常被认为比较软弱,不像男性那样富有竞争力和权力,所以女性做个人访谈时,被研究者会感到更加轻松,不必担心自己的地位或脸面受到威胁,研究者也将获得更加细致和准确的信息^[1-3]。当然,事情不是绝对的,性别的利弊转化还与具体的研究主题有关。在禁止女性参加某些宗教活动的社会中,对宗教活动进行访谈时,女性访谈者将面临更大的困难。在老年嫖客艾滋病感染风险的调查中,有些老年嫖客喜欢对男性访谈者炫耀自己的性频次和性能力,而他们对女性访谈者却较少炫耀。在性病艾滋病项目中,嫖客对男性研究者提供的信息可能会夸大,而他们面对女性研究者时则可能会保留部分信息。不可否认,或许会有相反情况的出现。另外,研究者的性别优劣势还会随着被研究者的性别而转变。笔者在某少数民族村落做艾滋病项目评估时,看到当地CDC的一位男医生问一位妇女安全套使用情况时,那位妇女突然害羞得捂着脸逃走。若是一位女性医生问同样的问题,被研究者可能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。

3. 年龄:不同的年龄暗含着不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,相同年龄段的人经历了共同的时代,有很多共同话题,交流起来通常更顺畅。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年龄差异较大时,可能会给调查带来障碍。有研究者认为,年长的被研究者可能不愿意接受年轻研究者的调查,他们会觉得自己生活阅历浅,不能理解自己的人生体验,所以不愿意多说^[1]。但在现实生活中,接受访谈的老年人也可能会像教导自己孙子一样与访谈者聊天,反而聊得更多。各种情形是复杂且不确定的,但是年龄作为影响调研效果的因素之一是客观存在的。

4. 其他:研究者在调查中会碰到自己的同乡,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拉近关系,便于资料的收集。但在涉及敏感问题时,同乡关系可能会使被研究者产生顾忌,担心自己暴露,会有意隐藏信息,再追问一些敏感问题会比较困难。研究者的性格特点和人格魅

力也会对被研究者产生影响,有的研究者真诚和蔼,善于倾听,使被研究者感觉亲切和放松,对方也就乐于提供信息。有的研究者过于严肃,就可能会给被研究者带来压力,不利于信息收集。有的研究者富于人格魅力,能很快让人产生信任感,使人乐于交流,则调查也将更加顺利。

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相遇时,研究者的身份特点不可避免地呈现在被研究者面前,被研究者会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。可见,资料的收集过程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交往,研究者的身份特点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双方的关系,以及资料的收集过程。

二、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及解决办法

1.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地位差异:在流行病学研究中,往往是由流行病学专家、各级CDC的医生或医学院校的学生来开展调查。研究者掌握着较为丰富的医学知识,他们是研究对象眼中的专家或权威。在这种情况下,被研究者对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仰视的态度,而研究者也难免会表现出一种俯视的姿态。这种不平等主要不是体现在双方的态度上,而是根源于两者身份上的较大差异。当研究者利用各种资源开展项目、召集被研究者参与调查时,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已经表现出来了。多数研究者是具有一定背景的科研机构代表,受相关部门委托和协助召集到相关人群。这种不平等的、普通人或患者与医生或专家之间的关系,有时会便于资料的收集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,被研究者或患者可能处于被救助的地位,他们把研究者当作权威和治病救人的医生,会尽可能详细和准确地向研究者汇报情况,寄希望于研究者能够解除他们的病痛。

2.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交往姿态:在面对较为敏感的疾病或问题时,研究者高高在上的位置和姿态不利于资料的收集。比如在性病艾滋病项目中对暗娼和嫖客进行面对面调查时,若研究者扮演权威角色,则被研究者为了寻求自我保护,会产生抵触和敷衍的心态。暗娼和嫖客处于不合法、不为主流道德接纳的地位,担心自己暴露、受到歧视或者被抓,他们与陌生人接触时的最初反应往往是转移话题或撒谎,以寻求掩饰和自我保护。若研究者简单地以拯救者的角色与之互动,很难获得信任^[4-5]。在这种情况下,研究者只有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和被研究者拉近关系,力求达成一种平等而轻松的朋友式交谈,才可能消除被研究者的顾虑,使他们在一种较为自

然的状态下提供相对真实的信息。对此,潘绥铭教授在《生存与体验》一书中谈到,“怎样才能真正平等的对待小姐呢?只有4个字,就是‘自甘堕落’,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外外的‘光环’彻底休克。否则,请离小姐远一点,让她们过自己的生活吧”^[6]。所以,潘绥铭教授在红灯区“入住考察”时,会“尽可能多地陪她们呆坐、打扑克、逛街、吃饭,哪怕这些对我的研究毫无意义也罢”^[6]。

然而,所谓的“平等”只是一种目标或理想,在绝大多数的研究中难以实现。在研究者划定研究对象,并且动用各种力量或资源召集被研究者时,其主导性地位已经明显体现。在这种情况下,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“平等”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交往的姿态。同时,这种平等的姿态也不能刻意为之,否则显得虚伪做作,反而会被研究者带来更大的压力或反感。事实上,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是有求于被研究者的。避开身份或权力上的差异,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都是具有平等人格的个体。因此,研究者面对被研究者时,必须具有真诚和尊重的态度。在这一点,人类学的调查态度值得相关学科借鉴。

3. 人类学的参考:按照人类学的学科要求,人类学者应以“甘当小学生”的学习态度开展调查。人类学特别重视对“异文化”的研究,当人类学者离开自己的社会,进入一个和自己熟悉的生活相差甚远的异文化时,一切都是陌生的,必须从头学起,要虚心向当地人学习,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。人类学者和当地人文交朋友,从良好和深入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当地文化知识。人类学者在研究“异文化”的同时也研究本文化。在本文化中,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,因此人类学者在调查研究时需保持虚心学习的态度,力求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这种虚心向被研究者学习的态度,即是对被研究者的一种尊重。

当然,人类学与流行病学的研究兴趣不同,人类学关注的是不同人群所具有的独特文化,流行病学关注的是人群与疾病有关的各种因素等。因此,在流行病学研究中,这种虚心学习的姿态稍显用力过重或理想化。尤其在调查大范围的人群时,上述人类学方法过于耗费时间和精力。从操作层面来说,从被研究者那里获取信息时,采用一种交换的方式似乎更为实际^[3-4]。在调查过程中,研究者常常给予调查对象金钱或礼物来表示感谢。当然,这种交换策略也需采用一定的方式和把握一定的度,以防止“被调查专业户”的出现^[4]。

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总是处于变化的社会环境中,研究者应根据具体情境具体把握,在调查过程中积极借鉴各种方式,根据研究的主题及研究对象的特点进行适应性选择。

三、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相对短浅的关系及应对策略

1.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相对短浅的问题:流行病学调查一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,覆盖较大规模的人群。由于研究对象人数多,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接触时间短,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相对较浅。在涉及敏感问题时,要获得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信息是较为困难的。比如在性病艾滋病项目中,在一面之缘的情况下,研究者询问嫖客性频次、是否使用安全套等敏感性问题时,被研究者常常会敷衍或抵触。即便是非敏感话题,想要获得真实信息也不容易。因为人们在面对陌生人时会有防备心,尤其当陌生人步步追问时,防备心会更加强烈。被研究者未必会直接拒绝回答,更多的情况是采用敷衍的方式,甚至会提供虚假信息。当问卷较长问题较多时,被研究者更加不配合。

2. 田野工作的利弊:若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最近的学科,应属人类学。“田野工作”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,它要求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长时间(曾要求满一个农业周期,即一年左右的时间)生活在一起,“同吃同住同劳动”,融进所在的文化或社区中。长时间的相处和交往,有利于拉近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,获得更为真实和深入的信息^[7-9]。比如传统汉族社会关系呈现出由近及远、由亲及疏的“差序格局”特征,陌生人刚进入时,一般只能处在人际关系的边缘,很多内部信息是不易获得的。而当与被研究者长时间接触,交往越来越深入之后,研究者可能会被当作朋友甚至是自己群体中的一员,这时才能获得较为真实有效的信息。人类学家庄孔韶教授在福建省古田地区调查时即经历了这一过程,在他问及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男嗣偏好时,曾在不同阶段先后获得“只生一个好(男)”、“一男一女较如意”和“两男一女最过瘾”3种答案^[10]。黄应贵教授数十年在一个村子内做田野工作,每年都要在这个村子里住上几个月,获得了村民们的充分信任,以至于他成了村民们的倾诉对象。人们有烦心事之后会主动来到他的小屋倾诉,其中不乏个人隐私和对他人的怨言。人们向其诉说,不求帮忙,只是当作一种发泄。可见,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的长时间交往,有利于获得更加深入的信息。长期而深入的“田野工作”固然

有利于拉近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,但这种方法费时费力,不易覆盖较大区域和较多人群。流行病学调查常常需要掌握大规模人群状况,因此采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也是不现实的^[11]。

3. 通过中间人拉近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:在各地开展性病艾滋病项目时发现,若当地CDC平时工作开展较好,已获得研究对象的信任,则可以利用这一关系快速顺利地开展调查。因此,各地CDC的日常工作就成为性病艾滋病项目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和环节。另外,相关人群中的关键人物也可成为中间人,汉族小姐常按照“类家族制”的特点组织起来,其中往往存在家长式的核心人物^[12-17]。笔者曾在西南地区某市的一个旅店式场所发现,旅店的二房东是一名暗娼,她租下了整栋楼,然后再把房间分别租给多位小姐,这些小姐以她为核心组织起来,称之为“大姐”。“大姐”在这些小姐中具有较高的威望,成为该小姐组织中的家长式人物。调查时通过“大姐”来动员其他小姐参与问卷和访谈,则可顺利开展工作。因此,在流行病学调查中若能充分发挥各类“中间人”的作用,拉近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,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总之,资料收集是一种复杂的人际交往过程。在资料收集过程中,不断反思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,分析其中存在的各种相关因素,根据具体的研究主题和调研情境进行适时的调整,减弱或消除不利因素,强化和利用有利条件,对收集信息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。

利益冲突 无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陈向明.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[M]. 北京:教育科学出版社,2000:119-122.
Chen XM.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 [M]. Beijing: Education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, 2000:119-122.
- [2] Weiss RS. Learning from strangers: the art and method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ies [M]. New York: The Free Press, 1995.
- [3] Trostle JA. 流行病与文化[M]//刘新建,刘新义. 济南:山东画报出版社,2008:86,91.
Trostle JA. Epidemiology and culture [M]// Liu XJ, Liu XY. Jinan: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, 2008:86,91.
- [4] 黄盈盈,潘绥铭. 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:方法论层次的反思[J]. 中国社会科学,2009(2):149-162.
Huang YY, Pan SM. Research ethics in social surveys in China: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[J]. Soc Sci China, 2009 (2) : 149-162.
- [5] 李江虹. 人类学者在艾滋病预防研究中常见的伦理与安全问题[J].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,2006,28(3):14-20. DOI:10.3969/j.issn.1673-8179.2006.03.005.
Li JH. Ethics and safety issues faced by anthropologists in HIV/AIDS prevention research [J]. J Guangxi Univ National: Phil Soc Sci Ed, 2006, 28 (3) : 14-20. DOI: 10.3969/j.issn.1673-8179.2006.03.005.
- [6] 潘绥铭. 生存与体验:对一个地下“红灯区”的追踪考察[M]. 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0:16,19.
Pan SM. Subsistence and experience: investigation on an underground red-light district [M]. Beijing: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, 2000:16,19.
- [7] 庄孔韶. 人类学通论[M]. 太原:山西教育出版社,2002:247-270.
Zhuang KS. Anthropology [M]. Taiyuan: Shanxi Education Press, 2002:247-270.
- [8] 庄孔韶. 人类学概论[M]. 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6:156-176.
Zhuang KS. Introduction of anthropology [M]. Beijing: Renmin University Press, 2006:156-176.
- [9] Gupta A, Ferguson J. 人类学定位——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 [M]// 骆建建,袁同凯,郭立新,等.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5.
Gupta A, Ferguson J.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: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[M]// Luo JJ, Yuan TK, Guo LX, et al. Beijing: Huaxia Publishing House, 2005.
- [10] 庄孔韶. 银翅[M]. 北京:三联书店,2000:499-503.
Zhuang KS. Silvery wing [M]. Beijing: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, 2000:499-503.
- [11] 宋雷鸣,汪宁. 定量与定性:人类学与流行病学合作的维度之一[J].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, 2015, 36 (10) : 1176-1180. DOI: 10.3760/cma.j.issn.0254-6450.2015.10.030.
Song LM, Wang N. Quantitation and qualititation: a dimension of integration of researches of anthropology and epidemiology [J]. Chin J Epidemiol, 2015, 36(10) : 1176-1180. DOI: 10.3760/cma.j.issn.0254-6450.2015.10.030.
- [12] 庄孔韶. 老年男客和低档暗娼艾滋病感染风险研究报告[R]. 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,2010.
Zhuang KS. HIV risk among elderly clients and low price female commercial sex workers [R]. Beijing: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,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, 2010.
- [13] 宋雷鸣,汪宁. “作为文化的组织”的人类学研究实践——Y市低价格女性性工作者和老年男客的组织文化解读[J]. 思想战线, 2012, 38 (4) : 13-16. DOI: 10.3969/j.issn.1001-778X.2012.04.003.
Song LM, Wang N. Anthropological Study Practice of Organization as Culture—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organizations of low prices female sex workers and their clients [J]. Thinking, 2012, 38 (4) : 13-16. DOI: 13-16. DOI: 10.3969/j.issn.1001-778X.2012.04.003.
- [14] 庄孔韶.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新形势和人类学理论原则之运用 [J].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,2007,29(1):58-65. DOI: 10.3969/j.issn.1673-8179.2007.01.010.
Zhuang KS. New trend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exual diseases and HIV/AIDS in China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principles [J]. J Guangxi Univ National: Phil Soc Sci Ed, 2007, 29 (1) 58-65. DOI: 10.3969/j.issn.1673-8179.2007.01.010.
- [15] 刘谦. 面对艾滋风险的自律与文化[M]. 北京:中国社会出版社,2010.
Liu Q. Culture and self-discipline in HIV prevention [M]. Beijing: Chinese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, 2010.
- [16] 李飞,庄孔韶.“作为文化的组织”的人类学研究实践——中国三个地区女性性服务者群体特征之比较及艾滋病/性病预防干预建议[J].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,2010,32(2):53-60.
Li F, Zhuang KS. Anthropological study practice of “organization as culture”—a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sex workers in three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and suggestions for controlling and intervening HIV/STI [J]. J Guangxi Univ National: Phil Soc Sci Ed, 2010, 32(2):53-60.
- [17] 宋雷鸣,汪宁. 人群和组织: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合作的维度之一[J].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, 2012, 33(4):439-441. DOI: 10.3760/cma.j.issn.0254-6450.2012.04.021.
Song LM, Wang N. “Group” and organization: a dimension of collabor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epidemiology [J]. Chin J Epidemiol, 2012, 33(4):439-441. DOI: 10.3760/cma.j.issn.0254-6450.2012.04.021.

(收稿日期:2017-04-27)

(本文编辑:王岚)